

《同舟共进》精选
重大事件 见证
权威史家 叙述

看“大家”，读《同舟》，
世间诸事不糊涂。

名家口述

王家声 等主编

WAP 世界知识出版社

名家口述

王家声 应春山 主编
孙宏光 郭芙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家口述 / 王家声主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012-4592-5

I. ①名…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近现代—通俗
读物 IV. ①K2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06231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胡孝文
赵 玥
丁洁琼

书 名

名家口述
Mingjia Koushu

主 编

王家声 应春山 孙宏光 郭芙秀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18 × 1000毫米 1/16 19印张

字 数

270千字

版次印次

2014年1月第一版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592-5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在吕正操将军家中	叶永烈 / 1
搞历史首先要把史实搞准确	
——关于刘少奇的若干史料辨正	阎长贵 / 7
要“蹲点”调查：刘少奇论“群众路线”	林蕴晖 / 14
朱德的“稿费”与“遗言”	刘 建 / 口述 周海滨 / 整理 / 20
忆爹爹朱德及康妈妈	赵力平 / 口述 周海滨 / 整理 / 24
伯父彭德怀	彭 钢 / 口述 周海滨 / 整理 / 35
陈毅元帅追悼会释放的信号	陈长江 / 49
胡耀邦的一次发言	沈宝祥 / 55
大地之子，人民之子	
——与伍精华谈耀邦	伍精华 / 口述 郑仲兵 / 整理 / 59
何方跟随张闻天的日子	胡孝文 / 67
和于光远先生聊“党内秀才”	王 凡 / 73
从博古的错误说起	秦 铁 / 口述 周海滨 / 整理 / 86
“红色公主”叶向真	
——凌子口述历史	周海滨 / 97
我经历的两次仰光爆炸事件	陈宝鏊 / 口述 宗道一 / 整理 / 109

“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整理真相.....	阎长贵 / 115
红卫兵报刊幕后往事.....	胡楠仁 / 122
“清队”杂忆.....	苏双碧 / 135
蔡旭：“学堂小麦王”的苦恼.....	陈徒手 / 143
大饥荒年代的城乡时滞.....	杨继绳 / 150
粒米如金忆当年.....	马龙闪 / 157
佟麟阁：抗日将领的生前身后事.....	佟 兵 / 口述 周海滨 / 整理 / 161
张伯驹：“此情欲诉少人知”.....	张传彩 / 口述 周海滨 / 整理 / 172
我和周信芳相处的日子.....	蒋星煜 / 185
耀邦同志为什么要改革.....	胡德平 / 口述 周海滨 / 撰文 / 191
林彪的读书生活.....	李 德 / 口述 舒 云 / 整理 / 204
我所了解的江青与康生的关系.....	杨银禄 / 212
“样板戏”的台前幕后.....	杨银禄 / 218
江青为何焚烧自己的得意之作.....	杨银禄 / 232
“乱云飞渡”与“无限风光” ——江青摄影史.....	杨银禄 / 236
我所知道的关锋.....	阎长贵 / 248
向张玉凤、汪东兴当面求证“常委名单”.....	杨银禄 / 277
《红灯记》戏里戏外.....	施京吾 / 279
样板戏的意识形态.....	施京吾 / 290

在吕正操将军家中

叶永烈

与宋美龄赛长寿

我在2012年第7期《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了《海峡两岸政要日记》一文后，想不到引起开国上将吕正操的女儿吕彤岩的注意。她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说吕将军去世后，留下一大堆日记本。她说与我是北京大学校友，她当年考入北大生物系，后来转入中国医科大学，希望我来北京时到她家看看。

金秋十月，我在北京采访十多天。我给吕彤岩打了电话，她很高兴地说：“我让选基去接您，他也没有看过，一起过来看看吕老的日记。”她说的选基，就是叶剑英元帅之侄。我与叶选基相识多年，对他做过几次采访。多年来他在香港工作，没想到这次居然在北京重逢，感到格外高兴。我上了叶选基的黑色轿车，直奔吕府。他还是那样，瘦瘦的，但是很精神。我告诉他，不久前在上海会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熊将军提及与他很熟。叶选基说，他俩都是老朋友。

叶选基对吕府熟门熟路，因为他曾是吕正操将军的女婿。吕彤岩很热情，如同导游一般带我参观吕将军的客厅、书房、卧室，还有她精心布置的挂满吕将军照片的“照片墙”。

我记得，熊光楷将军曾跟我说起一场有趣的“国共比赛”：宋美龄1897年3月5日出生于上海，2003年10月24日病逝于美国纽约，活了106岁。在吕正操将军生前，很多人鼓励他“战胜”宋美龄。吕彤岩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她手持一块粘着白纸的木板，放在父亲面前。白纸

上写着“今天1月4日，你的生日，106岁”。

吕彤岩说，这帧照片摄于2009年1月4日，是为庆贺父亲106岁（虚岁）生日拍摄的。吕正操将军生于1904年1月4日。他是在过了新中国60周年国庆之后，于2009年10月13日下午14时45分无疾而终，可以说差不多跟宋美龄打成了“平手”。

吕将军能够长寿，得益于他的一“动”与一“静”。所谓“动”，就是打网球。他在年轻时就打网球，晚年仍坚持打。离休之后，辞去各种职务，唯有中国网球协会主席一职不愿辞掉。请注意，他不是担任名誉主席，而是主席，直至他离世。所谓“静”，则是喜欢打桥牌，使脑子一直保持灵活。无独有偶，万里委员长也是长寿之人，2012年96岁，他与吕将军有着相同的爱好。万里在上中学时就爱上网球运动。吕正操是中国网球协会主席，万里则是中国网球协会名誉主席。万里同样是桥牌高手。更有趣的是，两人先后都曾担任过铁道部部长。

“考证”邓小平何时获知粉碎“四人帮”

在进入关于吕正操将军的采访主题之前，我趁着叶选基、吕彤岩都在，核对一个重要史实：邓小平在什么时候获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过去，有着种种传说：叶剑英元帅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曾派王震到邓小平那里，征询关于拘捕“四人帮”的意见；也有的说，邓小平曾到西山，与叶剑英研究过粉碎“四人帮”的方案……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否认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在邓小平被软禁期间，曾经秘密会晤叶剑英。邓榕引述了有关书报上的描写（《邓榕同志致本报编辑部的一封信》，1997年6月20日《作家文摘》）：

邓榕指出：

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去会晤叶剑英。邓小平与叶剑英的会晤，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春节前后。

处于软禁之中的邓小平，究竟是怎样获知粉碎“四人帮”这一至关重要的消息的呢？关键的人物，就是坐在我面前的叶选基和吕彤岩。

叶选基说，他得知粉碎“四人帮”，是在1976年10月6日夜11时。那是叶剑英的警卫长马西金奉叶剑英之命打电话，把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他。

吕彤岩说，她获知这一重要消息是在10月7日中午。那是父亲在上午出席了陈锡联主持召开的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回家之后显得异常兴奋。吕彤岩问他什么事情这样高兴？吕正操说“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

当天下午3时，叶选基来到岳父吕正操家。吕彤岩问叶选基，这一消息要不要告诉邓小平？叶选基说，你赶紧给邓家报信。由于邓小平处于软禁之中，他们担心邓家电话受到监听，于是吕彤岩乘公共汽车前往和平里，来到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家。（值得一提的是，吕彤岩对笔者称当时叶选基并不在场，是她自己决定去贺平那里，而叶选基则坚持是自己在红星胡同提议吕彤岩去贺平家。叶选基与吕彤岩两人当面对质，各持己见。考虑到叶选基通常对自己经历的细节记得比较清楚，所以笔者倾向于叶选基的回忆。）

叶选基为什么让吕彤岩给邓家报信，而不是自己去呢？那是因为吕彤岩跟邓榕以及邓榕的丈夫贺平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吕彤岩告诉我，她跟邓榕很早就认识。在“文革”中，邓榕在陕北插队落户，而她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之后也被分配到陕北一个公社的卫生院工作。很巧，跟邓榕所住的村子只隔5里路，所以过从甚密。她甚至还为邓榕介绍对象，把卫生部副部长贺彪将军的儿子贺平介绍给邓榕，她成了邓榕的“媒人”。正因为这样，贺平听到吕彤岩告知的重大消息后，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即骑车飞快地从和平里赶往宽街邓府。

如同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所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他（引者注——指贺平）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

人一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在那个时候，我们怕家中装有窃听器，因此凡有重要的事情，都会用一些防窃听的方式悄悄地说。我们大家——父亲、母亲和当时在家的邓林、邓楠，还有我——一起走到厕所里面，关上门，再大大地开开洗澡盆的水龙头。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音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部涌上心头。父亲十分激动，他手中的烟火轻微地颤动着，我们全家人，就在这间厕所里面，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解气地怒骂着，好像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无法表达心中的振奋和喜悦。

走笔至此，还要提一下，我这次在北京还采访了万里委员长的长子万伯翱、次子万仲翔以及小儿子万晓武，得知发生在北京医院高干病房里的另一幕——

叶选基在10月7日早上7时多，赶往北京翠家湾王震家。王震得知这一重要消息，立即驱车前往陈云家报告，又派儿子王军赶往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当时，作为邓小平的两员“黑干将”的胡耀邦、万里以及廖承志正在那里住院。自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来，万里便以患脉管炎为由，住进北京医院。当王军告诉他们特大喜讯，非常兴奋的胡耀邦拥抱了万里，还亲吻了一下！

当时，乔冠华也在那里住院，就住在万里病房对门。万里与乔冠华是老相识，但万里那时候是“批判对象”，不便去看望乔冠华，而乔冠华居然一次也未曾拜访咫尺之内的万里。在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开之后，乔冠华的病房门上贴了一张纸条“谢绝探视”！

从“照片墙”看吕正操

言归正传。吕彤岩指着她精心布置的“照片墙”，向我介绍吕正操的生平。吕彤岩说，“照片墙”选用哪些照片，放多大，都是她决定的，连镜框也是自己做的。

“照片墙”之一，挂着吕正操与张学良的诸多历史照片。吕彤岩说，父亲吕正操17岁参加东北军，是张学良的老部下，曾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张学良对他有知遇之恩。在西安事变时，吕正操奉张学良之命，负责接待周恩来所率的中共代表团。在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往南京，从此遭到软禁，而对蒋介石背信弃义极度愤怒的吕正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红色之路。

时光飞逝，沧桑巨变。1991年3月，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终于挣脱罗网，得以赴美。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前往美国纽约看望张学良夫妇，并邀请他们回大陆观光。吕正操是不二人选。1991年5月23日吕正操在女儿吕彤岩等陪同下，飞往纽约，终于与张学良久别重逢。吕正操带去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的亲笔信，而张学良把亲笔复函交吕正操带回，称“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可惜好事多磨，张学良竟然未能圆返梓之梦。

在“照片墙”上，我看到张学良1989年3月赠吕正操诗的手迹：

白发催年老

虚名误人深

主恩天高厚

世事如浮云

另外，还有一首：

孽子孤臣一儒，

填膺大义抗强胡，

丰功岂在尊明朔，

确保台湾入版图。

谒延平祠旧作，书寄

正操学弟正

此处提及的延平祠在台南，供有郑成功塑像。

我还看到当时美国报道刊登的张学良与吕正操在纽约的照片以及报道。

“照片墙”之二，交错挂着吕正操与张学良、黄敬、叶企孙、杜聿明的照片。吕彤岩以为，这四人与吕正操的人生有着密切关系，黄敬是吕正操的挚友与同志，叶企孙是高级知识分子、清华大学教务长。杜聿明则是国民党中将、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战俘。透过吕正操与不同身份的四人的交往，反映吕正操的品格、历史和命运。这是吕彤岩对父亲漫长的106年的人生道路进行长期思索之后理出来的“头绪”。她说，如果把吕正操与张学良、黄敬、叶企孙、杜聿明交错的命运写成一部纪实长篇或拍摄成一部电视剧，将折射20世纪中国的一段闪光的历史。

吕彤岩告诉我，父亲吕正操从1945年起开始记日记，现在家中总共保存了他的65本日记。她拿出日记给我看。我发现，吕正操日记字迹端正，很容易辨认。他的日记是鲁迅式的，即记录每天的工作、活动，不写思想、政治见解。这可能是考虑到中国“阶级斗争”岁月错综复杂的国情，所以用“中性”的笔调来写，以免因日记惹是生非。由于吕正操将军身居高位，而他的日记又相当详尽，所以具备历史价值。我建议她把日记全文扫描，先做成手迹电子版，然后再整理交付出版；也可以选择重要篇章，如访问美国、与张学良会晤的日记，先交杂志发表。

除了写日记之外，吕正操还记读书笔记。吕彤岩说，父亲吕正操是一个喜爱读书之人。她带领我来到将军的书房，那里“书天书地”，三面墙从地板到天花板全是书柜。下半部是现代书，上半部是线装古书，书的总数在万册之上。

我从“照片墙”上读到吕正操将军书写的两句心中的话，可以说是他百岁人生的写照，感人至深。其中一句写于2005年7月26日，时年101岁：人民永远是靠山。另一句写于2008年5月18日，时年104岁：人生下来有一个任务，活着就一直向前走下去。

（作者系文史学者、传记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

搞历史首先要把史实搞准确

——关于刘少奇的若干史料辨正

阎长贵

《党史博览》2012年第1期刊登了一篇文章——《刘少奇“文革”中两次公开“答辩”》，该文有不少史实不准确或不对。该文作者窦应泰先生写了十几部传记作品和小说，还有许多文章，是一位多产作家；他送我好几本书，我和他关系不错，我们是不止一次在一起开会谋面的会友。我爱朋友，但更爱事实和真理。我觉得对他这篇文章中的一些史实不予辨正，不论对社会和历史，还是对他，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该文第一段的头两句话说：“从1966年夏天‘文革’一开始，刘少奇就成为这场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基本上失去了发言权。特别是进入8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卫兵以后，刘少奇面对党内外不断掀起的口诛笔伐批判浪潮，头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者’‘帽子’的他几乎到了百口难辩的艰难地步。”

我想，经历过“文革”和认真研究“文革”史的很多人都会指出，这两句话从史实到结论都是不对的。

“文革”一开始，就“失去了发言权”？

先谈第一句话。该文说，刘少奇从1966年“文革”一开始，“就成为这场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基本上失去了发言权”，事实果真如此吗？

显然不是。“文革”从什么时候开始？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这个开始时间我们姑且不说。人们普遍认为，“文革”从1966年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开始。谁都知道，这次会议的主持人，正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能说这时刘少奇就“基本上失去了发言权”吗？诚然，《五一六通知》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这段话是毛泽东在审阅草稿时加写的，毛自己当然心中有数，至于其他人，莫说刘少奇本人没有意识到和想到这是指他（也有人说，他意识到了，但他想借严厉批判彭真躲开，这也是一种看法——作者注），就是当时正在走红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即将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都不清楚指的是刘少奇。康生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面检查了1931年他攻击过刘少奇的事：“当时职工国际有一个文件，说少奇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我也相信了，攻击少奇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还在《斗争》上登反对少奇同志的文章，（署）名为谢康，这个谁也不怨，只怨自己的思想错误。没有看到少奇同志是白区代表毛主席的路线的。”（据穆欣《梦醒时分——十年动乱纪事》，未刊稿；此稿是穆欣对他1997年在香港新天出版社出版的《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的修改稿。又见黄峥《“中国的赫鲁晓夫”最早不是刘少奇》，《文汇报读书周报》2012年3月2日）还有参加这次会议并随后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张春桥等，也不清楚“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

戚本禹1967年4月30日在中直礼堂作报告时说：“去年主席提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被培养为接班人，我们很不理解。”

张春桥1967年5月19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运动开始时……对‘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一段，我当时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没完全想到刘少奇。”（戚本禹和张春桥这两条材料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事实上，迟至7月底，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一直由刘少奇主持。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版)，自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刘多次主持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会议，直至8月上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才失去主持日常工作的权利。如此看来，说刘少奇“文革”一开始就成为“斗争对象”，“失去发言权”，显然不对。

该文在后面又引刘少奇本人的话说：“1966年7月底，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及各地来北京的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就是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在去年8月1日到李雪峰处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我到哪个学校去。经过研究，一致确定，我到建工学院去，李雪峰同志也决定一起去……”刘少奇在李雪峰等人陪同下8月2日到该院参加大会并讲话，8月3日又在李雪峰、谷牧和戚本禹陪同下到该院与“新八一战斗团”见面并和学生代表交谈。窦先生还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多年在家养病的林彪突然成了接班人，而刘少奇在常委中的排名则由第二位滑到第八位，这样刘少奇就无法继续过问“文革”运动了。这不是说到8月12日即这次政治局会议选出新的常委后刘少奇才“失去发言权”吗？如此，不是同前面所说刘少奇“文革”一开始就成为“斗争对象”、“失去发言权”自相矛盾吗？

顺便说一件与本文内容有关的趣事。最近有朋友发我一张人称“红卫兵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照片（据说这张照片《周恩来画传》有，我还没看到），从这张照片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刘、周都臂戴红卫兵袖章，三个人并坐在一起，谈笑风生；这张照片肯定是在毛泽东8月18日接见红卫兵以后拍摄的。这是一个历史见证，它形象且不可辩驳地告诉人们，说刘少奇在“文革”一开始（1966年5月）就成为“斗争对象”、“失去发言权”，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毛泽东从8月至11月8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都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参加了，这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可以查到。

按“反右”的思想、理论、策略指导“文革”

还需要指出，“文革”一开始，刘少奇不仅没有失去发言权、成为斗争对象，而且是领导和指挥“文革”批斗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他

按照1957年反右派的思想、理论和策略指导“文革”，在许多单位以及全国各地打了不少“右派”和反革命。

举个北京师大一附中的例子。当时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是该校高一学生，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并由他女儿向该校传达。6月9日，第一批工作组进校。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6月17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与刘少奇保持着直接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10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5%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90%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77%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劳改”，以致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及老师和老师、学生和学生之间的相互斗争甚至相互残杀。

工作组的做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6月20日，该校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为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像）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大字报贴出当天，刘少奇接见勾德元等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关于北京师大一附中的材料，参见肖喜东《1966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华夏文摘·增刊》第273期，引用时改动了个别叙述文字；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和北京师大一附中一样，清华大学以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为组长、王光美为顾问的工作组，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开展“反蒯斗争”，多次斗争蒯大富等造反者，被斗者中有人自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清华一

大批师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

刘少奇关于“文革”的指示和精神，不仅在北京贯彻执行，也在全国各系统和各地贯彻执行。刘少奇不断以中央名义批转文件，指导“文革”运动。

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西北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1966年6月2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中的批语全文为：“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除此以外，刘少奇在6月和7月还以中央名义批发或批转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央批转华东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6日）；《中央批转北京市委〈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66年7月6日）；《中央批转华北局“关于华北地区城乡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部署意见的报告”》（1966年7月8日）……

刘少奇批转的这些文件，无疑都是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方略的。如果仔细看一看这些文件，不难发现，刘少奇在“文革”初期的“发言权”够大、够重要了！

以上所举种种情况，都表明“文革”初期刘少奇有号令全国的“发言权”，“文革”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现象，也都与刘少奇的“发言权”有关（我说“有关”，是说不能把责任完全推到他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按照刘少奇의思想和逻辑搞“文革”，无疑也是一场灾难——一场比1957年反右派不知严重多少倍的灾难。刘少奇是“文革”中被整死的级别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株连妻子、儿女，以及不计其数的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这一大

冤案是事实，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刻骨铭心的，也是需要大家共同反省和反思的。一位开国元勋遭此残酷迫害，太值得人们同情了（后来平反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简直是一种“讽刺”），但研究历史、写作历史应当尊重事实，不为尊者讳，也不为弱者讳。如果因为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就否认或掩饰他在“文革”初期（我指的初期，是从1966年5月到1966年7月底）思想和行为的错误，那就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对由于这些错误造成的冤案涉案者同样不公道。

“资反路线”：“冬天”的帽子“秋天”就戴上了？

再说第二句话。窦先生说“进入8月”，刘少奇头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者”的“帽子”云云，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从已公布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毛泽东在1966年10月1日提出来，同时写进10月2日广播、10月3日才实际出版的第13期《红旗》杂志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说，有人“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并说“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10月以前，还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刘少奇怎么会戴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者”的“帽子”呢？这不是“张冠李戴”，而是“寅吃卯粮”，“冬天”的帽子“秋天”就戴上了。质言之，这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历史的演绎或者想当然。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毛泽东主持的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工作会议，10月16日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纲，把刘少奇指为这条路线的代表人。其后，在社会上也就听任造反派批判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应该明白，人们只有到这时才可以说，“刘少奇面对党内外不断掀起的口诛笔伐批判浪潮，头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